

# 罗蒂反基础主义及认识论立场下的语言哲学观

张智宏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自柏拉图开始的传统哲学带有基础主义情结并逐渐走入困境。分析哲学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入手, 试图以新的、科学的方法解决传统哲学的问题和困境。然而罗蒂认为, 试图把语言操作机制与传统哲学问题联系起来的做法只是让合理的研究被认识论所污染, 是“不纯粹的”语言哲学形式。通过对塞拉斯和奎因的分析, 罗蒂揭示分析哲学的根本缺陷——其基础主义底蕴及问题。这一批判成为其后哲学文化构建的起点。

**关键词:** 罗蒂; 语言哲学; 基础主义; 塞拉斯; 奎因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4)04-0012-5

## Rorty's View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rom His Anti-fundamentalist and Anti-epistemological Position

Zhang Zhi-ho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hich originated from Plato has always been with the fundamentalism complex and gradually gets into its predicament. By way of linguistic analysis, analytical philosophy tried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ith a new and scientific approach. Rorty maintains, however, that such attempt to connect language operational mechanism with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problems can only result in the contamination of sensible researches by epistemology, thus being an “impure” form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By analyzing Sellars and Quine, Rorty reveals the essential defect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 its fundamentalist basis and problems. Such criticism evolv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construction of 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

**Key words:** Rorty;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undamentalism; Sellars; Quine

### 1 引言

哲学发展到近代之后, 随着人类理智的进步及各具体学科的独立与发展, 开始面临来自神学、物理学和心理学等各方面的冲击。哲学所追求的必然真理的合法性和可能性被人们质疑, 由此引起喋喋不休的争执, 开始让人们感到厌烦。社会的不断变革和进步促使人类逐渐开始关注自身的发展, 原本作为哲学标志的“形而上学”因其对现实世界的漠视而逐渐被人们排斥, 很多学者开始对近代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自19世纪末开始, 西方学界面对传统哲学的困境表现出了各种不同的态度并提出各种解决方式。

按照罗蒂的看法, 对基础主义的态度而言, 这一时期的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以胡塞尔和罗素及分析哲学为代表的保守派, 力图重新确立“必然真理”的合法性地位。前者诉诸于“本质”, 认为“世界的这些

‘纯形式的’方面在非形式的方面被‘放进括号’时依然存在”(罗蒂 2004: 156)。后者则从逻辑的超验性、必然性中看到了希望, “宣称逻辑才是哲学的本质”(罗蒂 2004: 156)。这样, 他们“再一次开始了对严肃性、纯粹性和严格性的追求”(罗蒂 2004: 156)。另一部分则是以杜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革新派。他们表现出了较强的批判性, 并对必然真理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尤其是杜威对传统确定性偏向的批判, 最具代表性。杜威对传统哲学的这种实践性的批判在海德格尔的“释义学循环”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思想中也得到了呼应和延续。这些对罗蒂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事实上, 罗蒂也正是在汲取杜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资源, 同时受其前期分析哲学家身份的影响, 选择了以对分析哲学, 以及元语言学的批判入手, 力图把大写的哲学小写化, 进而建构一种“后哲学文化”, 对

基础主义进行彻底的解构。

## 2 分析哲学的基础主义及认识论底蕴——不纯粹的语言哲学

罗蒂认为,哲学在19世纪有两个极为明显的困境。其一,哲学被科学边缘化。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使其逐渐占据支配地位,这尤其表现在进化理论和生理学方面。它们在揭示有关人性的真理时并没有诉诸于传统哲学的那种内省和超验的论点,而是主动地舍弃了先验反思的立场,因为相比之下,心理学实验的方法与时代更为合拍也更为有效。此外,就知识本身而言,虽然康德所构想的研究是以一种知识理论为基础,“对特殊学科进行元批判”(Rorty 1979: 166),从而为知识寻得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自然科学视域下的实验知识在不需要什么认识论做后盾的情况下迅速发展,成就斐然。如此境况下,再把哲学置于“第一科学”、“一切科学之母”(Comte 1974: 19)的地位,就变得既不太切题也不太可信了。其二,对康德式假定的质疑也直接削弱了哲学。康德对于理性的偏爱以及对经验和感性因素的贬低,使其逐渐站在整体论的对立面。他通过直观、概念等元素把完全统一的整体进行了抽象的分割,使其成为一个个的分离的原子。这种观点自黑格尔开始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例如,黑格尔的“真理是整体”(The True is the whole)(黑格尔 1997: 12)的观点,詹姆士的意识流、柏格森的绵延等概念显然都是从整体论的角度对康德进行的批判。

在这种境况下,分析哲学作为反整体论和反历史主义的新康德运动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力图对这两个困境进行解决。在19世纪末以罗素及其逻辑实证主义为核心的流派逐渐统摄了西方哲学的主流。在他们看来,传统哲学的问题和困境应该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入手来解决,而分析哲学也可以为问题和困境的解决提供一种新的、改进了的方法。他们认为,如果把经验主义的传统与康德的对经验被动反应与主动命令之间的区分相结合,则似乎可以解决这个困境。因为经验主义元素使哲学看起来更为科学,而康德的元素则提供了一种哲学方法论所需的先验知识资源。另外,语言分析也更新了两种元素:一是经验主义,因为语句不像个人的、本体的那些含糊观点,语句是公共的、自然的,也因此更容易根据集体业已达成共识的标准来研究。二是康德哲学,因为原来把结构强加于经验的方法,现在可以看成是把意义强加于语词方法,这使得先前哲学家们在经验结构中对先验洞察的探究,现在可以被看作系统分析语义,以及语言句法逻辑的科学任务。这样,语言哲学似乎既没有脱离传统也与时代合拍。然而,这种观点在罗蒂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守旧而没有希望的选择而已。虽然这种观点曾盛极一时,但这种企图从社会领域抽取合理性证成(justifica-

tion)以转换成为哲学家非历史性的关注点的做法,显然是基础主义的一个典型变种,或者说是一种自然化的认识论。这种哲学模式虽然不同于传统哲学,但仍是一种错误的方向,其命运同样不济。这种模式并没有根本地认识到传统认识论哲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无法给予彻底的批判,相反在很多问题上却承继了传统哲学的思维理路。所以,罗蒂认为“从给出英语句子的真值条件,到建设一种权威圣典的概念来‘描摹实在的真实与终极结构’之间,无路可走”(Rorty 1979: 300)。

对于分析哲学的这种路向,罗蒂早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已表现出批判的态度。他通过分析大脑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得出结论认为,这两者间的因果理解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想些什么;同样的,对语言操作机制的机械式理解也无法告诉我们到底该想些什么。所以,在这种历史语境下,罗蒂认为,出现了“纯粹的”与“不纯粹的”语言哲学形式。那种“不纯粹的”语言哲学形式,试图把语言操作机制与传统哲学问题联系起来,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结果只是让一种合理的研究被基础主义、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所污染。比如,艾耶尔(Ayer)在剑桥大学的后继者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的研究就被罗蒂看作一种不纯粹视角的语言哲学研究。按照达米特的理解,弗雷格式研究是分析语言哲学最核心的研究,能够发现控制语言功能的基本逻辑原则,从而理解人类思想的本质。在达米特看来,语言哲学之所以被看做是“第一哲学”(罗蒂 2004: 246),是因为除非人们理解思想的本质,否则无法确定正在以正确的方式思考着类似于心灵或知识等哲学话题(Dummett 1978: 88-89, 442-43)。罗蒂对达米特方法总结道“达米特把弗雷格哲学语言化的结论理解为:解释得通形而上学分歧的唯一途径是语义上溯,从而把老的形而上学问题抬高成新的语义学问题”(Rorty 1991: 148)。达米特“把一种新的哲学活动与一个旧问题挂上钩,是一种最后的怀旧企图”(罗蒂 2004: 246)。罗蒂反对的不是“新的哲学活动”,因为以弗雷格的逻辑为基础提出的意义理论研究,是罗蒂所赞赏的纯粹语言哲学研究,而达梅特等哲学家对该研究的使用,则是罗蒂所反对的不纯粹的视角。

因此,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的序言部分,罗蒂明确地表示:20世纪哲学内部的分析运动的发展方向完全是自我削弱的(罗蒂 2004: 7)。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我认为分析哲学在奎因、晚期维特根斯坦、塞拉斯和戴维森那里达到了高潮,这也就是说,分析哲学超越并抵消了自己”(Rorty 1982: pxviii)。罗蒂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根本的原因在于罗蒂窥视出了分析哲学内在的康德基础主义精神实质及其现代视域之下的困境。而既然奎因、晚期维特根斯坦、塞拉斯和戴维森使分析哲学发展到了顶峰,那么对分析哲学最有力、最彻底的批判也应该从他们

的语言哲学理论本身入手。

### 3 罗蒂对分析哲学的批判

罗蒂认为,总结起来,分析哲学有两种赖以生存的康德式的区分:一是所予与非所予的区分,二是必然与偶然的区别。塞拉斯对所予神话(Myth of the given)的抨击与奎因对分析-综合之区别的抨击两相结合,彻底瓦解了这两种区分。在罗蒂看来,虽然他们本人并没有意识到的“同样的论点”(罗蒂2004:158),但客观的效果却达到了。罗蒂也正是通过对塞拉斯和奎因的分析,展示了分析哲学的根本缺陷,进而说明了“直觉与概念”这两种康德式的表象概念是如何“在分析运动后期陷入声名狼藉的境地的”(罗蒂2004:157)。这些变化与转向为罗蒂把哲学转向一个新的建设性探索方向铺垫了道路。

塞拉斯和奎因的观点在罗蒂看来是上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论点,因为他们不知不觉间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建设性努力,也削弱了整个分析运动。现在分析哲学之所以还“健在”,甚而某种程度上比从前繁荣,是通过一种刻意的“缺乏元哲学的反思”(罗蒂2004:160,译文略有不同。原文参见:Rorty 1979:172)实现的,其促成因素是分析哲学在学术机构中的地位安稳这一“社会学事实”(罗蒂2004:160)。也就是说,在当时多个国家,分析哲学是主要思想流派。所以,当罗蒂警告分析哲学之濒危时,所瞄准的是同为新康德复兴运动之中的分析哲学,而非现象学,这里唯一的原因是罗蒂自己身处分析哲学阵营,对此再熟悉不过,所做出的批评显然既能一矢中的,又可适用于哲学全局。

#### 3.1 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

按照塞拉斯在其《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的结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当作认识论的所予来对待:所予的观点认为,存在着某种确定基础,能把崇高的知识建于其上,塞拉斯认为,这个“所予”只是一个神话。知识根本不以任何“所予”为基础;唯理论的第一原则也好,经验论的知觉也罢,甚至康德体系的概念范畴都不能成为知识之基础。人类知识只是一种“自我纠正的活动,可以使任何主张岌岌可危,尽管并非突然间同时发生”(Sellars 1997:180-181)。塞拉斯认为,一旦我们放弃了知识是一种有一定基础、非习得能力的观念,即只要我们有知觉它就会发生,或者我们一思考就会发现它,我们就应该认识到“所有的意识……是一种语言活动”(Sellars 1997:63)。语言不是某种附加于前语言意识之上的抽象编码,而是一种媒介,通过在主体间和整体的意义网络之内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第一次意识到事物。由于我们的意识与其他东西一样,是一种“语言活动”,塞拉斯的知识概念与自然之镜所提供的知识概念判若云泥。根据自然之镜的概念,知识始于我们对自身心理状态的熟悉,这会产生知觉

之幕问题。但对于塞拉斯而言,心理状态的概念“与电子的概念一样具有主体间性”(Sellars 1997:107),我们只有加入一个语言使用者的社群才能感觉得到。用以谈论知识的语言学语境根据证据的标准而进行评价或论证,因此,塞拉斯认为,把心理状态描述成一个知识的例证,根本不像我们描述某物的形状或大小那样,是一种经验描述,而是将其放入“理性的逻辑空间”(Sellars 1997:76)里,即语言语境之中,心理状态于此语境之中,在概念上与事实多样性及事物状态相联系,事物状态会证明其合理性或在其基础上理性地推导出来。例如:说“约翰知道天在下雨”时,就是把约翰放进一个语境中,使他能够用其他恰当的语句证明自己的语句“天在下雨”是正确的。对于塞拉斯来讲,这就是知识所需的全部:语言实践之内的结点,而不是一种实践建筑其外的自然状态。

罗蒂从塞拉斯这里获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没有办法越过我们的信念和语言”,因此,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真实与正确是社会实践的问题”(罗蒂2004:165)。罗蒂由这一观念首创了两个被广为引用的比喻:一个是我们无法“跳出自己皮肤”(Rorty 1982:pxix),也就是说,要检验语言活动对世界的適切性,我们无法逃脱自己的语言活动。另一个是他后来说过的“没有什么天钩”(skyhook)(Rorty 1991:13)。意思是没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运送到社会环境之外,去比较人们所谈论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两个隐喻都蕴含了罗蒂对塞拉斯观点的吸收:人类知识不能以任何外在于人类交谈的东西为基础,因为并没有什么“所予”能超越理性讨论中你一句我一句的寻常话语。所以,罗蒂认为,哲学自身提供了场地,试图“跳出我们的皮肤之外”或把我们自己挂在那个悬空的“天钩”之上,以建立一种“永恒的中性架构”(罗蒂2004:166)——认识论,来决定一些非历史的条件,使精确再现世界成为可能。在罗蒂看来,认为断言和行为不仅要与其他断言和行为相协调一致,还要与人们所说所做之外的某些东西相“一致”的冲动,可以称为“哲学冲动”(罗蒂2004:166)。这一冲动的解药就是意识到“语言的无处不在”(Rorty 1982:pxx)。我们无法越过语言去和世界本身接触,我们既无法脱离构成我们语言的历史,也无法脱离语言所推动的社会,它具有塑造我们一切所说所想的要素。所以,我们必须放弃这种冲动,不从变化无常的社会领域获取信念,让信念依附于某种所予上,然后满足于由“社会让我们说些什么”所决定的知识(罗蒂2004:161)。对罗蒂来说,这意味着对3种东西的放弃:第一,放弃客观真理,因为没有什么外在于我们谈话之外的东西,可以强迫我们必须用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谈话;第二,放弃哲学,因为它存在的理由就是去决定准确地映现客观真理需要些什么;第三,放弃表象,因为它就是我们的语言与客观真理之间的映像关系。

这就说明,如果拒斥所予神话而赞同语言整体论,那么某物正确或错误的判断取决于“社会让我们说些什么”:这是一个语言活动或语汇内部的活动。与之相对应,表象则是一种“外在于语言的”活动,是语言与世界本身之间的关系。当然,表象活动也可以被判断为正确或错误:符应世界,则其为正确,反之为错。由于此判断无法被“社会让我们说些什么”所决定,必须“跳出自己的皮肤外”方可判定正误,因此表象主义与语言整体论是不兼容的,应该同所予神话一道被抛弃。

### 3.2 奎因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批判

罗蒂对于奎因的吸收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奎因对于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批判上。奎因这一批判主要出自1951年的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题目中两个教条的第一个是分析-综合的区分,第二个被奎因称为“还原论”观点,认为所有陈述基本上都能被改写成明晰的观察术语。

这两个教条在逻辑实证主义内部有教义上的关联性。逻辑实证主义把揭示普通或科学语句与感觉描述之间的等义分析性陈述视为哲学最为核心的任务。表明语言如何构建经验,因而需要用哪些经验证明或否定特定的陈述。然而,奎因认为,把整个语言的图画根本性地划分为两部分,一是提供构建经验之定义的分析性语句,一是有着精确观察结果的综合性陈述,这在语言整体论看来是站不住脚的。逻辑实证主义一直认为,保持他们基本的经验主义的信念既需要分析-综合的区分,也需综合陈述向观察结果的还原,但这是在教条地预设语言与经验之间的一种虚假关系。

奎因认为,语言与经验的关系是“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全部,从最为普通的地理历史到最为深奥的原子物理学或纯粹的数学与逻辑都是一种人造的组织,只是边缘性地影响经验”(Quine 1953: 42)。因此,并不是语言在于综合陈述与定义分析陈述之结合,其中综合陈述逐个对经验进行回应,比如,“雌狐的尾巴没了”被某些经验证实为真,而被另一些经验证明为否;定义分析陈述则根本不管经验的事,比如,“雌狐就是雌性狐狸”由于其意义即为真。与此相反,奎因把语言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其中所有陈述都集体对经验进行回应,所以,“我们有关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单个地面对感觉经验的裁决,而是作为一个共同团体来面对”(Quine 1953: 41)。由此,罗蒂从奎因对分析性的批判得出了以下观点:合理性证成(justification)是社会性和整体性的,而不建立在基础表象或特权表象之上的。

至此,罗蒂从奎因那里得出从塞拉斯那里所得出的同样结论:靠直接诉诸于自然之镜的表象,无法绕开社会判断。塞拉斯表明感觉的所予难担此任,奎因同样表明,分析真理亦难担此任:没有哪些语句由于其意义而成为

特殊的认识权威,因此意义无法做为知识基础。只不过塞拉斯的重点在感觉所予上,因为它们缺乏概念形式,而奎因的重点则在无法分割分析真理上。这一推理路数既反对了分析-综合的区分也反对了直觉-概念的区分,因为如果没有办法区分开只关乎概念的句子(分析的)与只关乎经验的句子(综合的),那就也没有办法区分开经验中的所予(直觉)与我们对它的解释(概念)。因此罗蒂把奎因对分析性的批判看作与塞拉斯一样,使用了“同样的论据”——语言整体论——来终结康德系统研究心灵如何命令经验的哲学观念,同样也终结了分析哲学作为新康德传人,分析语言强加于经验之上概念结构的哲学观念。

这也是为什么罗蒂认为唐纳德·戴维森(Davidson)属于纯粹语言哲学研究领域的原因。因为戴维森没有尝试把语言的操作机制与传统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使合理的研究被基础主义、认识论所污染。戴维森在1967年的论文“真理与意义”中提出了这种纯粹研究应该采取的形式(Davidson 1984: 17-36)。他主张,哲学家阿尔弗莱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提出的真理理论可以作为意义理论的基础。塔斯基的著作多以符号逻辑为主,表明如何为了某一特殊语言而定义真理,其中最突出的主张是:适合某一语言的真理理论能为该语言中所有语句提供遵循的对等形式。比如,当并仅当雪是白的时,“雪是白的”这个句子在英语里即为真。因此如果有一个英语里关于“真”的定义,那么就会对每一个单个英语句子暗示出对应形式。戴维森的想法是用这类对应项所陈述出的真值条件构建一个意义理论。正如罗蒂所说的“没有哪个单个的塔氏句子(即塔斯基真值条件)……能告诉你理解任何出现在右半部的语词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样句子的全体却能告诉你所要知道的全部”(Rorty 1991: 143-44)。至少根据罗蒂的解读,戴维森的研究与认识论毫无关系。相反,它是“田野语言学家的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 of field linguists)(Rorty 1991: 132; Davison 1986: 315)。这里面没有对经验结构的先验洞察,也没有把语义区分与传统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相联系。唯一的目的是利用弗雷格、塔斯基以及其他语言学家发展出的逻辑技术系统化语义区分或语言学行为。罗蒂因此认为,戴维森的语义学与康德传统划清了界限。在他看来,这种语义学才是纯粹的,这样的语言哲学才是合理的。

此外,罗蒂认为,如果把塞拉斯对所予的批判和奎因对“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批判结合起来的话,那么分析哲学就会得到彻底的削弱。因为塞拉斯和奎因的批判也完全适用于分析哲学自身。首先,分析哲学的创新课题是完成语言语法形式之下逻辑形式的任务,如果逻辑形式只是对付世界的信念系统中的信念之一,所发现的东西不比在语境中决定的东西多,那么就失去了潜在的活

力。第二,逻辑实证主义若想表明物理世界是如何从感觉数据构建出来的研究,不求助于感觉所予或与这些所予相联系的分析陈述就找不到起点,但是前者已被塞拉斯所削弱,后者则被奎因所批判。第三,“普通语言哲学”的中心是概念分析,它通过在包罗万象的想象情境中测试有效性的方式试图把模糊的哲学概念明晰化。如果并没有什么关于概念理解的分析真理,只有在社会之内做出的决定,那么概念分析就无需什么立足之地了(罗蒂 2004)。可以说,罗蒂借塞拉斯和奎因的手,挑出分析哲学内在的无法剔除的芒刺,从而为自己脱离分析哲学阵营,建构自己的后哲学文化找到了起点。

#### 4 结束语

通过如上分析,可以看出罗蒂的一贯立场: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需要再像传统哲学那样,为认识的合法性寻求一个永恒不变的基础了,因此,在基础主义理论视域下所推导出来的那些超历史的“真”、“世界”等绝对的哲学观念也应该被解构掉。“一个观点能‘面对一切未来之事’而被辩护,就是对它最如实的赞美了”(Rorty 2000: 56) 如果让它再继续声称它是客观真实的话,就会让它担当力所不能及的任务而引起各种麻烦和困境。如果说人类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某些悬而未决的古老问题,罗蒂则把这些古老问题看作欧洲历史某个阶段特定的文化产物(Rorty 1982: 16),因此不值得复兴。如果说哲学的任务便是处理这些悬而未决的老问题,那么实用主义者应该远离哲学,不管它是以形而上学面目出现还是以语义学面目出现,而且应该与元哲学立场上的非纯粹语言哲学研究交战。罗蒂的实用主义语言哲学立场很清晰:语言不是用来再现实在或表现内在的自我,而是用来解决问题好用或不好用的工具。这种整体论、实用主义语言观是罗蒂自《哲学与自然之境》之后思想发展的重要起点,他的偶然观(罗蒂 2005: 35)、隐喻观(罗蒂 2005: 27, 28)、反讽观(罗蒂 2005: 106),以及后哲学文化思想,都

有这一思想资源的表达。

#### 参考文献

-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罗蒂. 哲学与自然之镜[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罗蒂. 偶然、反讽与团结[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Comte, A. *The Essential Comte* [C]. London: Croom Helm, 1974.
- Davidson, D.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Davidson, D. A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Knowledge [A]. In E. LePore (ed.).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 [C]. Oxford: Blackwell, 1986.
- Dummett, M. *Truth and Other Enigmas* [M]. London: Duckworth, 1978.
- Quine, W. V.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W. Quine (ed.).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Rorty, R.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Rorty, R.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C].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2.
- Rorty, R.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1*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Rorty, R. Response to Jürgen Habermas [A]. In R. Brandom (ed.). *Rorty and His Critics* [C]. Oxford: Blackwell, 2000.
- Sellars, W.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收稿日期: 2013 - 08 - 07

【责任编辑 谢群】